



儒学·书院·社会

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

修订版



肖永明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儒学·书院·社会

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

修订版

肖永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肖永明
著.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093-3

I. ①儒… II. ①肖… III. ①书院—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291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儒学·书院·社会
——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
(修订版)
肖永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93-3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frac{7}{8}$
定价:58.00 元

序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释、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近 1300 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全国城乡,数量至少有 7500 所之多,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远达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 1901 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得以贯通。

以上是我对古代中国书院的一个基本看法。近日,拜读完肖永

明教授的大作《儒学·书院·社会》，受其启发，又有一些新的认识，谨此提出，以就教于书院研究的同仁与方家。

第一，书院是儒学的大本营。

从儒家内部来讲，书院与中央、地方官学都是儒家营地，它们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但在政府看来，官学为主，地方府州县学常常就直呼为某府州县儒学；书院为辅，朱熹、王守仁等都讲兴书院以匡扶官学。而实际上，庙学一体的官学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尤其是到王朝的中后期，官学往往流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的学校；祠学合一的书院却以辅助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家的教育责任，成为王朝学校的主体。

从儒家外部来讲，书院是儒学与佛道尤其是与佛教争夺势力范围的主阵地与桥头堡。天下名山佛占多。“邻居近金碧，一一梵王家”，这是宋人赵抃在《书院》一诗中发出的感慨。朱熹的年代，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而“儒馆”仅白鹿洞书院一家，若加郡县官学也就三家，其盛衰多寡之悬殊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他一再奏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其用意就在于与佛老争夺阵地。诚所谓针锋相对，以一对百，“不得不任其责也”。儒学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修复儒馆的举措理应得到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高官和同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并不理解，甚至反对。后来，是朱熹近乎偏执的书院情结和类似圣战的坚持，才促成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而《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成就了其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辉煌。

这里的问题是，作为统治思想营地的官学、书院与常常被定为异

端、淫祠的佛老之居,数量何以相绝如此?而修复书院,试图改变如此状况的努力,又何以得不到支持,甚或招致反对?或许,儒学内部的不支持、反对,就是答案所在?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只要不是政府刻意打压,佛老之居就能很好地生存,蓬勃发展,“遍满天下”。它凭什么占领如此众多的阵地?应该说,广大“善众”自觉自愿的供奉是佛老蓬勃的根本原因之一。吸引“善众”的是佛老学说本身,还是其普及、推广确有其道?在生存与发展方面,书院应该如何取法佛寺道观,值得思考。儒学书院的生存发展之道,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研究课题。

晚明以来,外来教会的教堂又成了书院的对手。明末,京师首善书院更名为天主堂,朱彝尊以“书院废而逆祠建”,表述其事。而雍正年间,沿海州县乘朝廷禁教之机,间有改天主堂为书院之举。这是新形势下的阵地争夺。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枪炮的保护下,传教变得“合法”而强势,教堂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于是教会推出“教会书院”以作为缓冲。在这里,异质的西方文化找到了生长点,传统的书院也找到了近代化的参照系。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于焉冲突、交流、交融,书院由此而开启了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书院与儒学的一体化。

书院既是教育中心,又是文化学术中心。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书院与学术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学者都创办或主持书院,潜心著述,讲学论辩,传播思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式的学术繁荣局面。儒学由此得以创新,演变而为后世所谓的“新儒学”。

尤其是“中兴四大儒”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的讲学,集合大批学者,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儒学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也因此变成了当年全国最著名的四大学术中心。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以书院为大本营,研究学问,创新学说,培养传人,聚集学术团队,使得书院和理学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而且,二者隐显同时,荣辱与共,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这种相互交错的结构形态和盛衰同命的生存状态,可以称作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它表明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则为书院的精神,是为南宋书院的最大特色。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历乾淳之盛、庆历党禁、嘉定更新三个时期,经由几代学人的努力,到真德秀、魏了翁的时代始得完成。书院和理学的一体化大致有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辑语录等四种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书院与理学之所以能够一体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在原因,那就是理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以及理学理论特点与书院对自主性的强调的内在契合。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古代书院以思想与哲学的光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的建构、儒学学派的产生、学术成果的形成、学术思想的传播等等,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书院与学术的流变图: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书院

在明代成为新学思潮的大本营,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音。

需要指出的是,书院与儒学的一体化,不仅使新儒学流衍传播于中国大地,而且随着二者一同移植于东国朝鲜、东洋日本,乃至越南,开创出东亚这一不同于佛教、伊斯兰教的儒学天空,捍卫了华夏文化在东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书院的社会属性。

书院既是教育的学术的文化的,也是社会的。唐宋以来,历代帝王、政府官员、地方家族、士人、商人等都是推动书院建设的社会力量,各种力量代表不同的利益而又分属官方与民间两大阵营,各自都想影响并制约书院的发展方向。这种格局,实际上使得官民任何一方都难以绝对控制书院,于是书院得以顺势与官民双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拓展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发展成为联系官民二者的第三种社会组织。我们认为,书院是社会控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大系统中发挥着控制作用。而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书院的社会控制主要表现在文化控制方面。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书院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能力的文化系统、教育系统、舆论系统、群体组织系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学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礼仪制度等是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内容,它们具有强化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是社会实现文化控制的重要力量,而书院则是从事儒家文化创造、更新、传播、积累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儒学发展的基地;教育是向人们灌输一定文

化知识、思想观念,从而控制人的文化行为的手段,它通过示范的作用、心理与行为法则的培养、伦常观念的培植、文化教育制度的建构等方式控制人的文化行为,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而书院是儒家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授徒讲学是书院的基本功能,是书院“四大规制”之一;社会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通过左右人的文化行为达到对社会进行文化控制的目的,而书院作为儒家价值观念创造、阐释、倡扬的主要场所,往往主导着社会舆论,对社会公众的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群体是社会的一个自我组织系统,在社会群体中,一定的群体思想支配着群体角色的行为,并培养着群体成员的认同心理和归属心理。书院是士人集聚、学习、生活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接受儒家知识的训练,接受儒学价值观念的灌输与熏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群体。因此,究其社会属性而言,甚至可以将书院视作一种民间组织而加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社会控制功能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书院与儒学、士人的紧密结合。正是书院、儒学、士人三位一体式的结合,才使书院成为社会文化控制的重要力量。在书院这一共同体中,士人通过对共同的儒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训练,产生共同而又特定的价值与心理取向,并形成共同而又特定的行为规范,实现对群体成员的文化控制。由于书院士人来源广泛,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与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价值原则、行为规范又会呈波状辐射到不同社会群体,传播到社会的不同阶层,使文化控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可知,书院在社会控制体系中担负着

重要角色。

以上三点,是我拜读《儒学·书院·社会》的粗浅体会,实际上也是肖永明教授为我们新开辟的研究书院的三个路径。作为长期研究宋明理学的专家,肖教授着眼于书院与儒学学派、书院与社会、书院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具体探讨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宋元时期的理学及明代阳明心学之间互相结合与相互促进,书院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及文化内涵、书院对地域文化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创获良多,时有思想、哲学的光芒闪耀,让人心明眼亮,豁然开朗。书中的新探索、新见解、新观点,不胜枚举,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自会感知,更愿书院研究同仁受其启发,循而开拓,共创书院研究的繁荣。

我与肖永明教授在八十年代中期先后来到岳麓书院,二十余年来,同在千年学府享受孔子、朱子、南轩张子等先圣先贤的阳光雨露,在圣贤的庇荫下,一起成长。因工作需要,我以治书院为业,他则专攻思想学术史。非常高兴,肖教授在岳麓书院第一个拿到了关于书院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今大功告成,专著即将出版,索序于我,虽荣幸之至,而又惭愧难应。唯久推不准,因而写下以上几点读书感言,权此充序,以应差命。

邓洪波

2012年5月25日于岳麓书院胜利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书院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社会文化环境	17
第一节 有关书院产生时间的争议	17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的加速及社会成员对文化的崇尚	21
第三节 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下移	29
第四节 官学教育系统的衰落	36
第五节 私学教育的盛行	43
第三章 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	51
第一节 历代君主对书院发展的促进及其动机	52
一、历代君主对书院的种种支持	53
二、历代君主支持书院的动机与目的	67
第二节 各级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及其动机	75
一、各级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	76
二、历代地方官员支持书院的动机与目的	93

第三节	家族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105
一、	家族书院的发展概况·····	106
二、	家族力量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动机·····	114
第四节	士人对书院事业的推动·····	120
一、	士人推动书院发展的种种方式·····	121
二、	儒家士人热心书院事业的动机·····	134
第五节	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140
一、	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140
二、	商人捐助书院的动机·····	146
第四章	书院与宋元时期的理学·····	154
第一节	宋元时期理学产生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	154
一、	北宋中后期:理学的逐步形成·····	155
二、	南宋前中期:理学的发展与成熟·····	160
三、	宋末及元代:理学官学地位的逐步确立·····	163
第二节	宋元时期书院与理学的逐渐结合与相互促进·····	166
第三节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探析·····	195
一、	从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看理学的教育 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	198
二、	理学理论特点与书院对自主性的强调的内在契合 ·····	208
三、	书院可以为理学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	214
第五章	书院与阳明心学·····	223

第一节	阳明心学的产生与发展·····	223
第二节	阳明心学与书院的结合与相互促进·····	232
第三节	阳明心学的兴起对书院讲学的影响·····	255
一、	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其制度化·····	255
二、	书院讲学形式的多样化·····	265
三、	书院讲学内容的通俗化与对象的大众化·····	271
第六章	书院与社会政治·····	278
第一节	书院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278
一、	儒学的社会控制功能与士人的社会角色·····	278
二、	儒学、士人与书院的结合及书院社会控制作用的 发挥·····	289
第二节	从历代书院政策看王权对书院的控制·····	300
第七章	书院祭祀的文化内涵·····	332
第一节	书院祭祀概况·····	332
第二节	书院祭祀的教育与社会教化功能·····	351
一、	确立、增强士人对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	352
二、	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	357
三、	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359
四、	书院祭祀的社会教化功能·····	363
第三节	书院祭祀与儒家道统·····	368
一、	道统说的起源及其本质·····	368
二、	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	375

第四节 书院祭祀与学术风尚的变迁	398
第八章 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发展	413
第一节 书院的学术研究活动对地域儒学学派思想学术 水平的提升	413
第二节 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地理格局	426
第三节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	442
一、书院藏书活动	443
二、书院的刻书活动	454
第四节 书院与地方的人才培养及民智的开发	461
第五节 书院对地域间文化交流的促进	471
主要征引文献及参考著作	484
附录 礼俗融会的书院文化空间	502
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	525
原版后记	549
修订版后记	553

第一章 绪论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终在清末因改制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书院虽历经曲折,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则一直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到清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总数达 4300 余所^①,遍及全国城乡。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荒陬边陲,都可见到书院的存在。不仅如此,书院还越出国界,传入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与文化传播的窗口。

书院的产生及书院制度的确立,是唐宋之际社会嬗变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科举制度下社会成员对文化的崇尚以及由印刷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文化下移,为书院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与物质条件,而官学教育系统的衰落及私学教育的盛行又为书院的兴起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土壤以及办学经验的

^① 有关历代书院的数量,不同学者统计结果差别很大,此处根据白新良的统计。参见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1 页。

借鉴。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支持。历代君主、各级地方官员以及来自民间的士人、商人、家族等社会力量基于不同的动机与目的,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致力于书院事业,推动着书院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书院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它具有知识积累与传播的功能,也承担着知识更新与创造的使命。由于书院具有相对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儒学思想与知识范式往往依托书院而酝酿、发展、传播,书院成为不同时代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基地。与此同时,书院也正是通过与学术的结合与互动,在组织方式、办学宗旨、讲习内容等方面发生变化,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品格,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并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实现自身在数量上的增加与地域上的拓展。

祭祀是书院规制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书院培养、教育士人的重要途径与方式。祭祀活动可以确立、增强书院士人对于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不仅如此,书院祭祀的影响还超出书院本身而及于整个社会,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在书院祭祀中,道统意识体现得十分明显。书院祭祀对象的确定与选择往往是从维护、宣扬道统的角度考虑的,不同的祭祀对象的选择与确定,所反映的是设祭者对于道统的不同理解。与此相联系,书院祭祀对象的选择与确立,也表明了不同学派、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追求与崇尚。通

过对不同时期书院祭祀对象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学术风尚变迁的大势。

作为一种与儒学、士人紧密结合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流思想的儒学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人阶层及民间社会传播、渗透,塑造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习俗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过程中,书院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当然,在专制王权极度伸张而私人领域、公共空间非常狭窄的政治环境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书院的存在与发展必然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与关注。从历代书院政策看,最高统治者总是力图将书院纳入其控制网络,尽可能掌握对书院的控制之权。到清中叶以后,书院就已逐渐丧失了其自主性,失去了自由讲学的传统。

作为儒家文化创造、积累、传播中心及人才培养的基地,书院在各地的建立与普及,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书院的学术研究活动大大提升了地域儒学流派的学术理论水平;书院的建立与普及也使儒家文化的空间分布不断地拓展,使儒学渗透到一些偏远僻陋之地,从而提高了当地的文明程度。同时,书院的建立及其文化传播活动还改变了区域内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等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地域文化地图随之改变;作为当地藏书、刻书事业的组成部分,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不仅如此,书院藏书、刻书活动在服务书院师生的同时,也往往服务于整个社会,在促进地方